

颠覆、转向与重构：后人类之“后”的多维解码

张覃林

贵州师范大学, 中国·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后人类”（Posthuman）作为当代学术话语的热词，其前缀“后”的意涵充满了张力与模糊性，将“后人类”理解为时间概念上的“人类之后”是一种误读，应从批判视角系统解码“后”的多重维度——作为终结颠覆、作为批判转向、作为融合重构。“后”不仅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的范式突破，更是后人类时代伦理再思的催化剂，其核心价值在于迫使我们重审“何以为人”，并在技术与人文辩证中探寻后人类时代的新型主体性与伦理框架，实现从“人类世”向“共生世”的跨越。

关键词：后人类；后人类理论；后人文主义；本体论批判

Subversion, Shift, and Reconstruction: Multidimensional Decoding of the "Posthuman" Era

Zhang Qinli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Guizhou Guiyang 550000

Abstract: As a buzzword in contemporary academic discourse, the prefix "post-" in "posthuman" carries a lot of tension and ambiguity. It would be a misinterpretation to understand "posthuman" merely as "after humanity" in terms of time. Instead, we should decode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os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as the end of subversion, as a shift in criticism, and as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ost-" is not only a paradigm shift from the anthropocentric ontology but also a catalyst for rethinking ethics in the era of posthumanity. Its core value lies in compelling us to reexamine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and to explore new forms of subjectivity and ethical frameworks in the dialectic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transitioning from the Anthropocene to the Post-Anthropocene.

Keywords: Posthuman; Posthuman theory; Posthumanism; Ontological critique

0 引言

自新世纪以来，“后人类”（Posthuman）一词如风暴般席卷哲学、科技、文化与艺术领域，标志着我们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存在论震荡。然而，这一概念的核心前缀——“后”却深陷意义迷雾，“在当代国内学界甚至包括西方学界，常常将“后”的两种有所差异的“所指”（“post”和“after”）都归到“后”概念的语义场之中，这就势必造成“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混乱”^[1]。表面上，“后”似乎指向时间维度的线性接替，暗示人类时代之后的某种新纪元，但若陷入此“时间陷阱”，则严重窄化了其复杂意涵。“西方学术界尝试从多个角度对后人类作出界定，大致将其分为未来主义后人类理论、批判性后人类理论、女性主义后人类理论、科技哲学后人类理论四个分支”^[2]。后人类理论早期影响颇大的一部著作《后人类状况》，引用麦克斯·莫尔（Max Moore）的表述，把后人类界定为“具有空前强大的物理能力、智慧能力、心理能力的生命个体，可以做到自我编程，自我界定，拥有超越死亡的潜能”^[3]。

加里·沃尔夫在《何谓后人类理论》中后人类是“基本能力远超当今人类的存在形式”^[4]，这种时间接替论本质是技术决定论的变体，其危险在于：第一，延续了以“人类物种更替”为中心的达尔文主义逻辑，与后人类对“中心”的解构目标背道而驰；第二，强化技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两极化想象，忽视了人类与非人类深度纠缠的现实复杂性。而今，“后”若沦为时间标签，将重蹈覆辙。实际上，“后”是一套交织的批判性操作系统，有着“解构”与“建构”双重意涵——它既宣告传统西方人文主义的范式危机，驱动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与伦理革命，又指向一种人-技术-自然共生的新型存在论构建。因此，本研究穿透“后”的语义迷雾，揭示其多重维度的辩证统一本质，以深化对后人类内涵的本质性把握。

1 “后”作为历史的终结：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解构

“后人类”之“后”有别于其他的“后-”理论，它不像“后殖民中的‘后’主要是对原殖民的延续”^[5]，也

并非后现代主义中的“后”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超越，将其视为线性时间轴上“人类时代”的终结符是一种严重简化的解读。这种理解背后，是传统西方人文主义（Western Humanism）根基的剧烈动摇——一种以理性主体、自由意志、身心二元论和人类物种优越性为核心构筑的文明叙事，正在技术与理论的夹击下土崩瓦解。“后”在此维度上，标志着“人之神话”历史阶段的落幕。

在理论层面，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早已为“人之死”敲响丧钟。在《词与物》中，福柯宣判“人”仅是现代知识型的偶然构造物：“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终将被抹去”^[6]。他揭示“人类”并非永恒范畴，而是18世纪末才被发明的话语产物。当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解构了“人”的同一性幻想，“人”作为认知主体的中心地位便遭遇合法性危机。随之，后人类理论家哈拉维（Haraway）的赛博格理论瓦解了“人类”作为生物学固定实体的定义。她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一书中将人类描述为一种人机混合物，“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7]。其存在本身即是对西方人文主义核心范式的解构。这些理论定义消解了有机体与机器的绝对分野，至此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遭到瓦解。哈拉维强调赛博格“没有伊甸园式的纯洁起源”，彻底否认“本真人性的自然神话”，迫使人类直面其存在的技术性、混杂性与生成性本质——生物学定义在此被重构为动态的具身化技术耦合进程。

再结合现实层面，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自然性”成为可塑的设计对象。通过编辑胚胎基因治疗遗传病、增强智力或体能，人类不再是纯粹“自然”的产物，而是技术介入的混合体。这直接挑战了人文主义关于人类本质固定和至高无上的观点。“人类”的边界变得模糊，我们开始像工程师塑造工具一样塑造自身及其后代，将“自然人类”降格为可以优化和完善的生物系统之一，而非超然的终点。当人工心脏维持血液循环、神经植入体增强感知能力时，人类肉体不再是纯粹自然造物，而是与技术深度互嵌的人-技共生系统，这些案例描绘了一种未来：人类不再是孤立的、自主的、固定的宇宙中心，而是嵌入巨大的技术、生物和信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类的定义、边界、能力甚至伦理地位都变得流动和可塑，人文主义所推崇的“大写的人”的主体性神话在后技术现实中不断被消解。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夹击下，西方传统人为主义的根基随之坍塌。

在这过程中，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试图以技术救赎重构“终结”：它将“后”解读为人类通过自我增强进入“后人类”新纪元的历史必然，主张通过基因强化、意识上传、纳米改造等手段，使人类摆脱疾病、衰老甚至死亡。虽然超人类主义“同样也可以被当作对人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因为它试图借助技术超越人类生物和心智的局限”^[8]，表面看这是对“终结”的积极超越，实质上，它延续并放大了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进步迷思，超人类主义的线性进化观将“后”简化为物种升级，实则是将人文主义危机转化为技术解决方案的幻象，即便打着超越的旗号，却因延续人文主义的中心性逻辑而沦为“终结”的共谋。虽然技术冲击揭穿了“人类例外论”的生物学虚妄，理论批判解构了“普遍主体”的政治虚构，但“后”作为历史的终结，绝非宣告人类物种的物理灭亡，而是西方人文主义范式的认识论破产。真正的“终结”是解放的契机——它迫使我们正视人类中心的局限，并向一种容纳非人类力量（技术、动物、环境）的新存在论敞开。在此意义上，“终结”并非终点，而是通往批判与重构的必经之门。

2 “后”作为批判的转向：从人文主义到共生网络

后人类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的是“启蒙人文主义”及其所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霸权。这种思想范式自17-18世纪兴起，成为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科学和伦理的主导意识形态，后人类批判在解构了旧霸权后，并未停滞，而是转向更为复杂、紧迫和基础性的新问题域，即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关系性网络化存在”。

在这一转向中，首当其冲的当属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布拉伊多蒂的“普遍生命力”理论强调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平等关系，反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她认为“生命不仅是人类的特权，而是所有生物、自然和文化共同拥有的本质属性”^[9]。其核心在于从“人类利益至上”的立场转向“生命共同体”立场。这种“普遍生命力”是后人类快乐伦理的核心支点，强调生命之间的平等性、合作性与生成性。不仅如此，罗西·布拉伊多蒂的游牧主体理论（nomadic subjectivity）拒绝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强调身体本身即是流动生成的场所与媒介。身体并非固定容器，而是充满生命潜能的力场，在与其他身体、技术和环境的互动中持续“成为”。跨性别者的身体重塑、移民的语言与文化适应、依赖假肢或神经接口的赛博格存在，都体现了这种具身的游牧性——主体通过不断

“跨越疆界”，在差异中重构自身。后人类情境下的流动生成被布拉伊多蒂赋予了强烈的政治与伦理维度。流动主体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代表着一种新型伦理的可能：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承认物种间相互依赖，并在多重他异性中建立非剥削性的连接。这种流动不仅是地理或身份的漂移，更是本体论层面向“非统一、动态、生成之主体”的彻底转向。

可见，后人类之“后”完成的转向，是将人类思想从一个禁锢于人类自我神话的“人文主义堡垒”中解放出来，并将其抛入一张充满异质性力量、深刻内在关联、持续共同塑造的“共生网络”。这个转向，是从“本质”到“生成”、从“中心”到“节点”、从“掌控”到“共生”、从“注定”到“可能”的根本性嬗变。这场批判转向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它既是启示录——无情揭示了旧支柱的虚幻与崩塌；更是行动书——要求人类必须以前所未有的谦卑与自觉，在承认自身根本依赖性与有限能动性前提下，与所有参与编织我们存在之网的“他者”（动物、植物、环境、技术、乃至病毒与算法）展开艰难而富有责任的共同创造。后人类时代，批判不再是拆毁过去，更是在混沌的网络中不断定位、反思并负责地参与“我们如何共同成为”的永续实践。

3 “后”作为融合与重构：从人类世向共生世

“后”标志着后人类思想不是止步于破坏，而是积极迈向对存在形态的创造性再想象，力图回答批判之后“我们该如何存在”的核心问题。这里的“融合与重构”绝非简单拼贴或浪漫化的整合，而是在深刻承认对稳定人本主义主体的消解的基础上，探索“主体性”如何在动态的再造过程中生成新的形态。

理解“融合与重构”需要彻底摆脱将“主体”视为既成物或目的地的传统思维。“新主体的诞生”并非指代一种取代旧人类、更优越、更稳固的终极主体形态，那将是另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或超人类主义的陷阱，而是指主体性本身被理解作为一种在动态关系中不断重塑的流动节点。它的“新”，新在对其构成成分、生成过程与存在状态的认知上，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形象正是此点的核心原型。赛博格并非科幻中的未来幻想，而是对当下现实的隐喻：从心脏起搏器、智能手机延伸到基因编辑技术、智能算法嵌入日常生活乃至神经接口的探索，人类的物理存在、感官体验、认知决策与情感联结早已无法脱离技术物而单独界定。这不是外挂工具，而是深度内化、共同构成“我”的物质基础；同时，环境污染（微塑料进入血液）、肠

道微生物菌群、伴侣动物的情感互动等，都确证了“纯粹人类”边界的虚妄。我们身体内部与外部的疆界是渗透的、开放的，主体是跨越生物/人工、有机/无机、自然/文化边界的异质性物质-符号纠缠体。“新主体”的存在本身即是融合的证明与产物。

新主体的“重构”指向一种动态的、情境化的、生成性的主体化过程。这与传统固定、统一、理性的主体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从上述提到的罗西·布拉伊多蒂提出的“游牧主体”概念再次得到启发：既然主体性生成于持续的差异之中，而非追寻不变的一同性。新主体没有本质内核等待发现，而是在“机器-有机体-环境-符号系统”的异质性交互网络中，因此其形态是流动的、不稳定的，因关系的变化而持续重构。这种“重构”时刻在发生，它包含转化、创新，也包含矛盾、失控与异化。

这种对主体的理解，必然引向“共生”（*sympoiesis*）这一核心概念。不同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性“生存斗争”，也超越生物共生学中通常暗示的和谐互利或寄生关系，“共生”意指“共同创造”（*making-with*）——一个系统不是由孤立单元独立制造，而是在多方行动者（人、非人、技术）动态的、非对称的、有时甚至是对抗性的互动、缠结与相互回应中共同生成的。“在后人类时代，人类不能像以往那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也不能主宰所赖以生活的地球的命运”^[10]。它否认单一控制中心的存在，承认过程的多中心性、结果的不确定性与参与者角色的模糊性。这是一个互相塑造的过程，我们无法准确定义是谁在塑造谁。因此，“共生之可能”远非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共存，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责任深重的共存模式之召唤与探索。其关键在于：如何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本质性的纠缠中，进行有意义的、负责任的“共同创造”？这既是实践难题，也是伦理挑战。在存在论层面，“共生”要求彻底接受新主体的“融合体”本质，承认我们的存续和繁荣无法脱离我们与之共同演化的复杂网络。对抗生态危机不是“拯救地球”（地球无需人类拯救），而是拯救适合人类与其他复杂生命共同持续的“共生”条件。在伦理与政治层面，“共生”引发尖锐问题：当AI作为深度嵌入社会决策的行动者时，我们如何与它们“共生”？当基因编辑技术重写生命蓝图时，如何在人类、非人生物（农作物、动物）、环境系统的共生网中评估“优化”的伦理？这些问题都强调关系性正义而非孤立个体的权利。

综上所述，“新主体”并非一个稳固、统一的完成体，而是一个在与人造物、非人生命体、环境力量的无休止互

动与共生性创造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进程。“共生之可能”正是对这种新的存在方式与伦理挑战的直面与探索。它标志着后人类思想的核心关切从“我们曾经是什么”(批判)转向“我们可以一起成为什么”(重构)。要明白,“‘现在’是人类整体发展中的某个阶段,是人类为达到终极目标所必然要借助的台阶”^[1],我们终将要进行对深刻的不确定性的拥抱,同时也是对在复杂性中共同创造更丰富、更公正的生之可能的执着追求。后人类的“后”,至此才完整其双面性——毁灭旧偶像是为了给更具包容性与活力的“共生”重构开辟空间。因此,“新主体”与其说是一个已诞生的实体,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承诺与持续的任务。

4 结语

“后”解构着过去,重构着未来。”对后人类之“后”的深入解码,揭示其并非一个单纯的时间性后缀或消极的终结宣告,而是一个充满思想张力与时代关怀的多维入口。“后”宣告了那个自洽、理性、统御万物的主体神话的瓦解,粉碎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人与技术等僵化二元对立所构筑的本体论堡垒,这一批判维度是深刻的、必要的,它迫使我们在科技深度重构生命形态的当下,直面“人类”概念本身的虚构性与排他性。“后”的深刻意义更在于其超越批判的创造性潜能。它标识着一个拥抱融合、催生新主体、吁求共生的时代转折点。新主体的诞生不再是回归稳固本质,而是在动态生成中不断塑造自身,成为异质性的“赛博格”式存在。这一存在状态的核心理念是“共生”。“共生”摒弃了掌控自然的幻想,强调在扁平化的行动者网络中寻求脆弱但韧性的共同创造,要求发展全新的认识论与伦理框架。可见,后人类之“后”的丰富意蕴,最终凝结于批判的深度与重构的可能性的辩证统一之中。“后”并非宣告人的终结,而是启动了对“何以为人”的彻底重思。它要求我们在意识到自身作为深嵌于复杂网络中的“行动节点”之渺小与依赖的同时,毅然承担起更广泛、更深刻的关系性责任。它挑战我们放下旧有的特权幻觉,

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以谦卑而勇毅的姿态,投身于构建一种更具有包容性、责任感与创造力的多物种/技术共生未来的可能性之中。“后”是人类迈入不确定性门槛的标志,亦是开启一个重新定位自身、与他者共生的新思辨与实践纪元的宣言。

参考文献:

- [1] 罗崇宏. 当代“后”概念的生成机制及理论启示[J]. 文学评论, 2024(01):106-113.
 - [2] 杨建国. 生命的游牧——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04): 66-75.
 - [3] PEPPERELL R. The posthuman condition: 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brain[M]. Portland: Intellect Books, 1997: 170.
 - [4] WOLFE C. What is posthumanism[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 [5] 刘庆. 论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在殖民主义理论转型中所起的作用[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9, 21(04):84-88.
 - [6]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422.
 - [7] (美)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M]. 陈静译.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321.
 - [8] 李恒威, 王昊晟. 后人类社会图景与人工智能[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05):80-89.
 - [9]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M], 宋根成译,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8.
 - [10] 王宁. 后人文主义的崛起: 兼论后人类时代的人文学术研究[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02): 83-90.
 - [11] 王淑娇. 法国古今之争产生、过程及理论依据[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8, 20(01):82-88.
- 作者简介: 张覃林, 男, 苗族, 贵州遵义人,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西方文论。